

中国引领亚太经贸合作机制转型分析

陈友骏

【内容摘要】 在全球经济经历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亚太经济凭借其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的发展活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心,而亚太地区在全球地缘经济架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随之同步性上升。这种结构性的突变迅速生成变革亚太地区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力量,并引发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格局及规则等均产生显著变化。中国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为亚太经贸合作树立正确且长远的价值观取向。不仅如此,中国在参与和引领亚太贸易和投资多边治理机制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向这一地区输出制度性的公共产品,并努力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新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完善的方向前行。在未来亚太经贸合作协定谈判中,中国应积极尝试导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并使其能充分体现在相关的条款和内容之中,借此逐步推动亚太地区的双多边合作内容的有序扩展和合作模式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 中国 亚太区域 经济治理 改革 引领

【作者简介】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全球经济经历金融危机的重大冲击之后,亚太地区经济凭借其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的发展活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心之一,同时,其在全球地缘经济架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同步性上升。这种结构性的突变迅速生成变革亚太地区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力量,并引发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格局及规则等均产生不同程度的显著变化。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一员,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定增长以及其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贡献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已经跃升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领导力量,对整个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一体化合作产生较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参与并引领亚太贸易和投资多边治理机制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尝试向这一地区输出制度性的公共产品,并积极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新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完善的方向前行。

一、亚太经济蓬勃发展与治理体系亟待转型的尖锐局面

从地理经济的视角来看,东西方经济的非对称性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后亚太经济的率先复苏,致使全球对亚太经济牵引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和期待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英国脱欧等经济问题的复杂叠加,引发全球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并不看好,进而转变为对未来欧洲经济走势的极度担忧。相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中日韩 FTA、亚太自贸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以及曾轰动一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等,这些既定或潜在的经济合作协定的持续发酵,促使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关注视线逐渐聚焦亚太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为带动全球经济走向复苏提供了希望和信心,也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此外,世界前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和日本均位于亚太域内,这无疑是亚太经济吸引全球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GDP超过11万亿美元(2015年同数据为10.4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为4.38万亿美元(2015年同数据为4.84万亿美元);美国的GDP升至18.03万亿美元(2015年同数据为17.39万亿美元)。由此,中美日三国GDP的总和飙升至33.4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总量(74.15万亿美元,2016年)的45%。^①

不仅如此,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总量在过去20多年间表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据参加成员均来自亚太地区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官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见表1),截至2015年年底,APEC成员的GDP总量业已攀升至44.0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74.29万亿美元)的59.28%;APEC区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55万美元,显著高于这一数据的世界平均值(1.01万美元);APEC区域的年经济增长率也高于世界平均值0.4个百分点,达到3.1%。与此同时,2015年APEC成员的总人口总数超过28.47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超过73.46亿人)的38.76%。而在吸引外部资金流入方面,2015年APEC地区

^①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成为全球 FDI 流入的最大目的地 ,FDI(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总额高达 9525 亿美元 , 占世界 FDI 流入总量的一半以上; 与其相对 2015 年 APEC 区域的 FDI 流出量高达 8214.6 亿美元 , 同样占世界 FDI 流出总量的半壁江山。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4 年全球 55% 的 FDI 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① 流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FDI 总量为 3810 亿美元 , 占全球 FDI 总量的 31% , 同比增长了 9.6%。^② 因此 , 从各项统计指标来看 , 亚太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潜力 , 并成为驱动世界经济有效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表 1 APEC 主要经济指标(2015 年)

	APEC	世界	比值(%)
GDP(万亿美元)	44.04	74.29	59.28
人均 GDP(美元)	15 510.20	10 112.30	153.38
GDP 年增长率	3.1	2.7	-
人口(亿)	28.47	73.46	38.76
人口增长率(%)	0.7	1.2	-
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总额(万亿美元)	10.24	21.38	47.90
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额占 GDP 比重(%)	23.3	28.8	-
货物及服务出口贸易总额(万亿美元)	10.2	21.27	47.95
货物及服务出口贸易额占 GDP 比重(%)	23.2	28.6	-
货物贸易占 GDP 比重(%)	37.8	44.7	-
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	8.7	12.7	-
FDI 流入(亿美元)	9525.87	17621.55	54.06
FDI 流出(亿美元)	8214.6	14742.42	55.72
可贸易指数	4.83	NA	-

注: ①可贸易指数为 2016 年的统计数据; ②比值 = (APEC 数值/世界数值) × 100。

资料来源 “StatsAPEC,” http://statistics.apec.org/index.php/key_indicator/kid_result/66。

与经济贡献同步提升的是亚太地区的政治重要性。尤为引人瞩目的是 , 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 , 促使亚太地区再度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关注的焦点 , 这无形中也提升了亚太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价值。尽管全球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褒贬不一 , 莫衷一是 , 甚至有部分观点认为这一战略的潜在矛头对象就是中国 , 可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产生不利因素 , 但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调整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和资源配置 , 其本身就直观地解释了亚太地区的重要价值和政治地位 , 而且势必会引起全球对亚太地区各个领域的关注和期待 ,

①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bop/2015/pdf/15-21.pdf> , p. 2.

② Ibid , p. 39.

其中当然也包括贸易和投资领域新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与庞大的经济总量和快速增长的贸易及投资规模相比,亚太地区显然缺乏统一且完善的经济一体化合作安排,这突出表现在亚太贸易投资领域。换言之,亚太地区需要一个系统化、战略性的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并且,就世界主要区域经济的合作现状而言,北美地区建有NAFTA,而欧洲则在欧盟框架下设置了一系列经济合作框架等。与之相比,亚太地区亟需建立明确且完备的贸易投资合作架构,以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性的经济治理机制中,尤其是贸易和投资规则领域,世界贸易组织(WTO)仍然享有最高声誉。^①WTO覆盖了整个亚太地区,基本有效地维持并确保了亚太贸易和投资秩序的稳定运行。但是,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始终难以达成令各方满意的最终成果,致使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优化进程面临困境,“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双边与诸边的贸易谈判逐渐成为国际经济谈判的主流和各方关注的焦点”。^②尽管如此,由于亚太域内各个经济体基本都是WTO成员方,因此WTO的现行规则和制度就成为亚太域内贸易投资治理机制的主要构成,同时也成为制定域内其他新贸易投资协定文本的重要参考。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双、多边和地区经济合作协定的层出不穷,WTO所建立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确受到一定的挑战,甚至在部分问题上存在“边缘化”的危机。尤其是双边和地区贸易合作协定中的相关条款,有些协定内容比WTO规定得更细、更具体,有些协定内容超越了WTO的既有框架,涉及反腐败、竞争政策、环境法、劳动力市场限制甚至反恐等新兴议题。这些新要素的出现实则也为WTO的改革提供了不竭动力。

除WTO在亚太域内发挥基础性经济治理功能之外,APEC是域内国家和地区协商经济一体化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③而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TIF)是APEC落实茂物目标的三大支柱之一。^④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的推进和落实,同时也是为了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促进亚太

① 黎兵《全球经济治理相关领域的理论探索》,《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2期,第49~50页。

② 贺平、沈陈《RCEP与中国的亚太FTA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44~45页。

③ 李文韬系统地评估了APEC框架下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合作进展情况,着实说明了APEC在海关程序、标准与一致化、商务人员移动、推广电子商务和营商便利化(Ease of Doing Business)等5个贸易便利化优先合作领域的具体成果。具体内容参见李文韬《APEC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进展评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亚太经济》2011年第4期,第13~17页。

④ 李文韬《APEC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进展评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亚太经济》2011年第4期,第13页。

框架下贸易投资合作的实质性突破 ,APEC 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合作成为这一平台的优先合作方向 ,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①

除 APEC 这一传统的经济合作平台以外 ,近些年涌现出的 TPP^②、RCEP、中日韩 FTA 协定等涉及贸易投资问题的新经济合作框架 ,凸显亚太经济合作的新发展趋势。

首先以 TPP 为例。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 ,随即签署总统备忘录 ,宣布美国正式退出 TPP ,但 TPP 协定中的相关内容和条款等反映了美国对未来对外经济合作 ,尤其是如何设定贸易投资领域合作框架的战略设想 ,因此仍有必要对 TPP 进行深入研究。

实际上 ,有多数观点认为 TPP 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③但也有观点认为 ,TPP 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并促进经济改革 ,而且 TPP 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所有 FTA 设定了新标准。^④由此 ,TPP 等新型贸易投资协定的出现 ,以及 TTIP、服务协定(TISA) 、RCEP 等不同类型的贸易投资协定的涌现 ,并没有对既有的世界贸易投资治理机制带来积极效果。相反 ,种类繁多、内容复杂的协定文本已经扰乱了全球贸易投资治理规则的正常发展 ,而“意大利面碗”效应的进一步发酵导致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的未来发展失去了前进方向 ,甚至其原本应有的发展动力也日渐式微 ,威胁到以 WTO 为基础的既有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的存在和价值。

当然 ,TPP 自身仍存在巨大的非确定性因素。一方面 ,TPP 各参与方在谈判之初就存在巨大的矛盾和分歧 ,其最终协议的签署也是参与各方迫于美国的巨大政治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 ,显现出极大的妥协成分;另一方面 ,TPP 协定的内容和具体实施进程等均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干扰 ,其未来能否得到参与各方的认可、是否具备足够的生命力以及其能否最终实现稳妥的推进和落实等都是未知数。鉴于此 ,

① 李文韬详细介绍了 APEC 框架下互联互通合作所取得的具体成果 ,同时尖锐指出中国参与 APEC 互联互通合作的挑战及内外制约因素 ,并对此提出了战略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参见李文韬《中国参与 APEC 互联互通合作应对战略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第 105 ~ 116 页。

② 沈铭辉具体阐释了 TPP 与 WTO、APEC、中美 BIT、RCEP 等协定之间的功能性区别 ,以此揭示美国借助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工具 ,稳固其在全球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中领导地位的战略意图。具体内容参见沈铭辉:《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基于美国贸易战略的洞察》,《天津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 ,第 80 ~ 84 页。

③ Xinquan TU, “Defining the 21st Century Governance: Impact of TPP o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http://www.ideascentre.ch/?p=6430> p. 1.

④ Jeffrey J. Schott , Cathleen Cimino-Isaacs and Euijin Jung, “Implication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for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https://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implications-trans-pacific-partnership-world-trading-system>.

TPP 并不能代表整个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也不能成为亚太贸易投资治理机制的最终版本。但不可忽视的是,TPP 至少反映出部分亚太国家及次地区希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烈意愿,以及对亚太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向质量化和纵深化发展的期待。

除 TPP 之外,另一个涉及面较广、内容较为全面的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就是 RCEP。^① 尽管后者仍在紧锣密鼓的谈判之中,但因为 TPP 在美国国内遭遇重大政治障碍,所以 RCEP 又重新成为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亚太相关国家关注的焦点。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相较于 TPP 而言,RCEP 采取“渐进式自由化”的推进路径,对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 ASEAN 成员国实行特殊和区别对待的政策。^② 不仅如此,RCEP 实则也采取了“低门槛准入”、“共同协商”的模式,希望能尽早结束谈判,签署基本的合作框架。尽管如此,参与方之间对 RCEP 的目标分歧业已成为阻碍 RCEP 谈判的主要障碍。具体而言,日本希望参考 TPP 的内容和规定,将其植入 RCEP 的相关条目中,以构建“高水平、高标准”的示范型合作框架。但参加 RCEP 谈判的多数成员方均为发展中国家,且它们中的多数也无法接受类似于 TPP 那样的高标准经济合作协定。这样一来,RCEP 的谈判桌上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股势力,双方的意见对立严重拖累了 RCEP 的谈判进度,也使 RCEP 的具体内容和框架设计等充满了不确定性。

除 TPP 和 RCEP 之外,亚太地区的另一潜在经济合作框架就是中日韩 FTA(China-Japan-Korea FTA) 协定。相较于 TPP 和 RCEP 而言,中日韩 FTA 协定的参与国较少,且三方之间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并不如前两个合作协定那样显著。尽管如此,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还是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干扰,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政治因素。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国内社会保守主义思想的抬头,助长了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影响力,并致使其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多个敏感问题上“开倒车”。日本安倍政府多位重要阁僚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在钓鱼岛、“竹岛”(韩方称“独岛”)等领土问题上挑衅周边国家;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甚至篡改历史,不仅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存在,更歪曲慰安妇问题,致使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均跌至“冰点”。受此影响,中日韩 FTA 协定谈判也深陷僵局,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果突破。而且,政治上的相互冲

^① 全毅和沈铭辉回顾了东盟提出 RCEP 的历史背景和发生过程。具体内容参见全毅、沈铭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中国视角》,《国际贸易》2014年第6期,第57~61页。

^② 贺平、沈陈《RCEP 与中国的亚太 FTA 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47页。

突促使中日韩各方均不同程度地抬高了谈判的筹码,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三边协商的操作难度,也使谈判的最终妥协变得越来越遥遥无期。

当然,除了多边合作协定以外,双边合作协定也是亚太经贸合作的主要抓手和突破口。其中,对于中国来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或许是正在交涉中的、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合作协定。这不仅仅是因为中美BIT的交涉对象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同时,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中国更希望借中美BIT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多边经贸合作,并不断提升合作的层级和水平。为此,中国已同意在中美BIT谈判中就“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相关问题进行谈判,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决心和诚意。不仅如此,在国内实施的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中,中国更是积极实践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尝试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为中美BIT和其他潜在的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实践经验。

此外,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12年3月15日正式生效)等既有的双边贸易投资协定也是亚太地区经济治理机制的有机组成。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前既有的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相比,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涉及较广,层级较高,且部分规定条件较为苛刻,因此,它并不具有完全的代表性,更难以适用于经济发展仍处于中低水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除了合作框架数量过多的自身矛盾之外,政治博弈的加剧更激化了亚太贸易投资问题的复杂性。特朗普新政府起步之后,随即宣布美国正式退出TPP,同时将其对外贸易投资的合作重心转移至双边范围的谈判协商。在此背景下,日美经济合作协定或日美FTA的设想逐渐浮出水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日本安倍政府不得不无奈地接受美国的“邀约”,放弃与美国共同建设TPP合作框架的预想,转而集中精力与美国协商双边框架的经济合作协定;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支付巨大成本才最终达成的TPP框架,仍觊觎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TPP成员国合作,促使TPP能尽早生效。由是观之,可以预见的是,一旦日美两国间就经济合作或建立FTA等达成某种协定,其相关内容一定是以TPP为基本框架,并要求在相关领域的开放水平和制度改革等方面超越TPP。最终,极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所谓“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经济合作协定。当然,这一协定能否最终达成主要取决于日美两国的政治博弈及其内部政治和经济等界别的意见妥协。鉴于日美两国国内社会对这一敏感议题均具有不同的意见分歧,因此短时间内仍难以给予明确定论。

综上所述,亚太地区充斥着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双多边经济治理机制,上述内

容仅是各种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代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亚太经济治理的部分特征。

第一,亚太既有经济治理机制业已呈现出“意大利面条碗”显著特征。毋庸置疑,亚太经济合作治理机制的发展符合国际和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但是,数量繁多且合作水平参差不齐的经济治理机制的丛生已破坏了亚太域内整体经济治理机制的有序发展,而且,由于各个双多边治理机制或次区域治理机制的水平和质量的差异,导致相关成员方在未来次区域治理机制的发展目标及如何战略性地整合亚太地区治理机制等关键问题上发生明显的意见偏离,致使后续议题难以获得有效的协商和拓展。

第二,受到其他地区或多边合作机制的干扰和影响,未来亚太贸易投资治理机制的转型和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例如,美国主导的 TTIP、TISA 等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以及可能被修改的 NAFTA 协定等,均不同程度地对亚太贸易投资治理机制产生冲击,既约束了亚太自身治理机制转型和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同时也弱化了亚太内部团结合作的一致性和整体性,导致亚太在构建贸易投资治理合作机制问题上明显“失速”。

二、亚太地区经济领导权的政治博弈

关于亚太贸易投资新机制的政治分歧,突出表现在对 TPP、RCEP、FTAAP 等新规则的观点博弈之中。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随即宣布美国退出 TPP,但因 TPP 实则反映出美国国内社会精英阶层的主流意见,同时也象征着美国对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设计的理念和趋势,因此美国退出 TPP 只能是战术上的,暂且“退避三舍”以求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规则设计等核心问题上取得更大的主动权。美国在战略上仍觊觎牢牢掌控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促使富有美国理念的“自由贸易投资”规则能够重新被世界所认可。基于此,本文仍将 TPP 纳入研究视野,并将系统地阐述它与其他亚太贸易投资合作规则之间产生的博弈和影响。

首先,尽管 TPP 前途未卜,但以其为代表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小多边经济治理协定的频繁出现,业已引发亚太域内的激烈争论。

对此,有学者就尖锐地指出“TPP 事实上把多边贸易谈判暂时搁置、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难接受的‘新加坡议题’纳入跨区域 FTA 谈判机制,力图重建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和‘游戏规则’,变传统的‘对等交换市场准入’为‘非对等交换国内改

革’对 RCEP 形成了现实的‘规则竞争’乃至‘规制冲击’。”^①更为矛盾的是,日本将 TPP 视为“21 世纪的地区贸易协定”,^②并试图将 TPP 的规则条款引入 RCEP、中日韩 FTA 等其他亚太贸易投资规则之中,造成相关协议谈判陷入久拖不决的僵局。

此外,尽管特朗普政府宣布放弃 TPP,但美国试图建立类似于 TPP、TTIP 的“高水平、高标准”的经济合作协定的意图和趋势业已非常清晰,在接下来美国所参与的任何对外贸易投资协定中,应该都能够见到 TPP 的身影。但是,因为 TTP 和 TTIP 包含大量发展中国家暂时难以接受的“高水平”规则,所以一旦达成,许多新兴经济体将被迫游离在外,导致世界经济面临新的分裂。^③

另一方面,从供应链的研究视角来观察,尽管 TPP 协定被视为“21 世纪的地区贸易协定”,有助于从制度层面推动供应链的全球化布局,但实际效果却可能完全相反,即 TPP、TTIP 等贸易投资协定的出现,反而会造成生产供应链的“去全球化”分布,供应链范围缩小至相关协定的缔约国所构成的小体系内部。不仅如此,TPP 还冲击了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完整性和可塑性。对此,2011 年年底东盟着手推进 RCEP,主动回应 TPP 带来的负面效应,以维护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④

其次,关于未来亚太贸易投资规则的理想模式和实践路径等议题,亚太区域内也存在不同观点。

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唯有学会“背靠”、“融入”各种国际制度,一国的国家利益才能真正得到维护。而且,“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不是一味被动地遵守‘霸道’与‘王道’主导下的既有机制,而是力图在灵活‘守制’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制度创新’,最终达到‘改制’、‘建制’的长远目标”。^⑤国际制度尚且如此,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规则自不待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构建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 FTAAP 议题上,中国、美国和日本等亚太域内国家是存在共识的,战略上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但突出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实现路径的差异,即究竟是以中日韩 FTA 为跳板,抑或是以 RCEP 为过渡,还是以

① 贺平、沈陈《RCEP 与中国的亚太 FTA 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53 页。

② 中川淳司「TPPと21世紀の貿易・投資ルール」,ポストTPP研究会:「ポストTPP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の経済秩序の新展開」,平成27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16 年 3 月,第 7 页。

③ 樊勇明、贺平《“包容性竞争”理念与金砖银行》,《国际观察》2015 年第 2 期,第 8 页。

④ 沈铭辉《自由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基于美国贸易战略的洞察》,《天津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第 83 页;全毅、沈铭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中国视角》,《国际贸易》2014 年第 6 期,第 61 页。

⑤ 高伟凯《自由贸易与国际利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5~86 页。

TPP为桥梁?显然,中美日三方之间没有明确的共识。相反,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和主导权的战略考量,三方在上述问题上存在激烈的政治博弈,致使FTAAP的最终路线图难以形成一份最终的方案。

APEC“北京路线图”涵盖了各方就FTAAP问题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比如说,FTAAP与多边贸易进程是互补的,其性质是全面的、高质量的、涵盖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的;APEC是FTAAP的孵化器,TPP和RCEP是FTAAP的实现途径,需要开展相应的能力建设等。^①但必须指出的是,就建设FTAAP的长远目标而言,如何实现TPP与RCEP的并轨,并没有明确的路径和方法。^②从这一层面来看,中美日三方必须尽快就此问题展开协商,并尽可能地统一意见,促使FTAAP能够尽早落地,尽快生效。

欧洲学者研究指出,FTAAP可以有效去除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这不仅有助于FTAAP域内国家的贸易增长,更能为域外的亚洲国家创造巨大的贸易增长和发展动能。而且,在后一个关键问题上,FTAAP所产生的效果要超过TPP等其他亚太域内的经济合作规则。^③

最后,对于如何促进亚太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融合,各方存在显著的意见分歧。

应该说,建立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合作机制的出发点都是希望推动相关经济体的合作一体化和经济发展,并且大多数既有的合作机制已经实现了上述目标,绝大多数的参与主体均依托这样或那样的合作机制实现了自身的经济增长。

但仍存在部分难以克服的现实困难,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与全球性经济合作机制之间可能产生相互抵制、相互背离的情况,致使两者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和理念上出现严重分歧。诚如部分国内学者所言,“RTA(区域贸易合作协定)当下的发展势头明显强于WTO,且大有局部替代WTO多边贸易体制之势。RTA的这种发展态势明显地损害了多边贸易秩序的公信力,影响了WTO在国际贸易治理中的应有地位”。^④不仅如此,RTA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补充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由于不同的自由贸易安排使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也造成了“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区域

① 唐国强、王震宇《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与优先任务》,《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77页。

② 馬田啓一:「TPPとアジア太平洋のFTA:経済連携の方向性」,ポストTPP研究会:「ポストTPP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の経済秩序の新展開」,平成27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6年3月,第37页。

③ Cora Jungbluth, Rahel Aichele and Gabriel Felbermayr, “Asia’s Rise in the New World Trade Order: The Effects of Meg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Asian Countries,” <http://www.bertelsmann-stiftung.de/de/publikationen/publikation/did/asiars-rise-in-the-new-world-trade-order/>, p. 28.

④ 陈立虎《论RTA急剧增加对WTO法律发展的负面影响和补救》,《国际商务研究》2016年第2期,第25页。

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碎片化的危险。^①

另一方面,RTA 更容易引发贸易转移效应的发生。需要警醒的是,TPP 等新贸易投资规则一旦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主流,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将会大幅调整并重新布局其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传统格局。这样一来,新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势必将削减未参与 TPP 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中就包括中国等广大的亚太发展中国家。

应该看到的是,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对外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仍是美国,而其又是亚太乃至世界的主要消费市场,因此这些有利因素为其创造了掌控亚太贸易投资规则主导权和主动性的积极条件。相比之下,中国或日本都不是亚洲出口商品的主要最终消费市场,两者均无法提供占绝对优势的出口市场,因此中国或日本均“难以独自推动排他性(排除美国)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更是难以摆脱美国的影响。^②

此外,美国的亚太贸易投资战略方向是坚持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自由化并行的方针,这一基本战略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即,以美国与亚太主要国家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先端,构建以美国为“轮轴”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并使其覆盖或替代其他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最终建立美国主导的 FTAAP。换言之,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指向美国的贸易转移,建立新的 FTA 标准和规则,推动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制衡和约束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和影响力,最终实现以美国主导的亚太贸易自由化推动 WTO 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③但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尤为强调双边协商机制的建立,并竭力突出美国在其中的主导性和决定权。与此同时,针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与美国存在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则采取了强硬立场,甚至不惜动用有违自由贸易理念的相关措施,意图在短时间内实现美国的贸易平衡。显然,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战略转型已对亚太经济合作机制的转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一,特朗普政府频繁动用所谓的贸易制裁措施,实则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后者将通过不同机制传导至亚太经贸合作的协商平台,并最终阻碍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其二,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外经贸战略折射出浓重的“经济单边主义”色彩,但这或许会加速日美 FTA 的谈判进程及美韩 FTA、NAF-

① 唐国强、王震宇《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与优先任务》,《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76页。

② 沈铭辉《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从 TPP 到“一带一路”》,《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第75~86页。

③ 刘中伟、沈家文、宋颖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与亚太区域合作的新机遇》,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117页。

TA 等与美国息息相关的双多边机制的重新修订。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事件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亚太域内部分双边经贸合作的水平与层次,但同时也会加剧域内经贸合作的等级差分及“领头羊竞争”,进而增加未来亚太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其三,对中国在亚太经贸合作中的角色扮演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行事风格反而容易对比性地衬托出中国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经贸合作理念,更有助于中国在推动亚太经贸合作进程中树立威信,彰显特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面对亚太经贸合作的可能性变局,中国必须提高警惕,因应而变,积极向亚太域内和全球市场提供国际贸易领域的公共产品,同时不断壮大和开放本国消费市场,为他国产品提供更为丰富、更为高效的出口市场,以此扩大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力,进而在未来构建 FTAAP 的议程中尽可能发挥中国的主导力和影响力。

三、中国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

为了更为直观地分析中国对亚太贸易投资发展的贡献,就必须关注亚太地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分布情况,这实则也有助于从产业链分工的视角凸显中国在亚太贸易投资合作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表 2 主要国家和地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占出口对象地的相应比重(2011 年)

比重: %

	出口	世界	TPP	RCEP	FTAAP	中国大陆	日本	NIES	ASEAN	NAFTA	EU15
中国	中间产品	100.0	42.7	33.1	66.3	N/A	10.1	7.3	9.3	24.7	15.6
	最终产品	100.0	43.2	24.0	58.2	N/A	10.4	12.0	4.9	26.6	16.5
日本	中间产品	100.0	24.0	56.4	82.5	29.7	N/A	9.5	13.3	16.2	7.9
	最终产品	100.0	31.0	34.9	65.2	15.5	N/A	18.0	9.0	22.9	10.0
韩国	中间产品	100.0	26.7	60.8	79.8	37.7	7.8	2.4	11.6	12.2	6.0
	最终产品	100.0	31.5	37.5	59.5	16.3	7.4	3.9	7.9	17.1	8.4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中间产品	100.0	27.6	67.6	82.6	38.9	5.4	5.2	13.1	11.7	10.7
	最终产品	100.0	30.2	55.2	76.2	32.2	6.2	7.0	9.6	17.2	7.1
ASEAN	中间产品	100.0	39.2	68.7	82.3	18.2	14.5	5.1	19.3	9.6	8.9
	最终产品	100.0	40.8	41.2	66.2	8.8	7.0	10.4	12.1	21.1	11.3

	出口	世界	TPP	RCEP	FTAAP	中国大陆	日本	NIES	ASEAN	NAFTA	EU15
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	中间产品	100.0	41.3	73.1	83.0	20.9	14.4	5.6	10.2	6.3	8.0
	最终产品	100.0	39.5	48.0	66.2	12.0	5.2	11.0	9.5	15.0	9.7
印度	中间产品	100.0	23.8	29.9	47.2	10.7	2.8	3.2	10.8	13.8	24.8
	最终产品	100.0	31.1	15.0	41.7	3.5	2.0	7.0	6.0	23.6	22.1
NAFTA	中间产品	100.0	62.8	17.2	75.6	6.2	3.6	2.3	2.4	56.2	13.0
	最终产品	100.0	61.8	12.4	69.9	3.0	3.2	3.5	1.8	55.3	10.0
EU15	中间产品	100.0	14.9	14.1	27.8	5.7	1.9	1.4	2.5	10.1	49.0
	最终产品	100.0	15.7	9.6	24.1	2.9	1.7	2.1	1.6	11.5	46.2

资料来源: 柳田健介:「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貿易投資構造」,ポストTPP研究会:「ポストTPP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の経済秩序の新展開」,平成27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16年3月,第71页,「表2 各国・各地域の中間財・最終財の輸出先シェア(名目値、2011年)」。

如表2所示,中国大陆对TPP域内国家和地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42.7%和43.2%,可见中国大陆对TPP域内国家和地区出口依存度较高。日本对TPP域内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占其总出口份额的24%、31%,与其相对,日本对RCEP区域出口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占其总出口比重却高达56.4%和34.9%,可见日本主要的出口贸易集中于RCEP域内,而与TPP域内的出口贸易依存度相对较弱。

与NAFTA、EU15显示出显著的域内贸易特点相比,东盟(ASEAN)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内部出口比重均不足两成,显示出东盟主要出口对象是域外国家和地区,而它对TPP、RCEP、FTAAP出口依存度逐级递增,表明3个协定对东盟可能产生的潜在利益也相应增加。

不仅如此,中国、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NAFTA等亚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主要集中在FTAAP区域范围内,而相较于中国,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NAFTA对FTAAP域内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比重较高。由此,上述国家和地区与FTAAP的关联度明显高于中国,并且,FTAAP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产生的潜在利益比重也高于中国。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中国对于亚太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也不断提升,这无疑为中国引领亚太和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

了坚实的理由和信心。

日本学者柳田健介根据 OECD 投入产出数据库的资料,计算了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列昂惕夫逆矩阵数据,并因此推导出影响力指数和感应度指数两个重要数据。^①其中,影响力指数表示最终需求每增加 1 个单位,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生产增加的幅度,即表示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感应度指数表示世界所有产业的最终需求每增加一个单位,对特定国家各产业生产的刺激效果,换言之,其表示受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举例而言,2000 年中国第一产业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单位,可以产生 2.05 个单位的生产增加;而 2000 年世界所有产业的最终需求增加一个单位,引发中国第一产业生产增加 1.69 个单位。^②

因此,观察表 3 后不难发现,与 2000 年相比,2011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和影响力均具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尤其表现在中国的第二产业。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中国第二产业的影响力指数达到 3.43,其中,对国内的影响力指数为 2.88,表明其国内影响占绝大部分;对国外的影响力指数为 0.55。

表 3 影响力指数(列昂惕夫逆阵列系数之和)

	2000 年			2011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国大陆	2.05(0.14)	2.98(0.46)	2.53(0.20)	2.18(0.17)	3.43(0.55)	2.72(0.25)
日本	1.89(0.12)	2.34(0.22)	1.69(0.08)	2.17(0.29)	2.59(0.48)	1.75(0.16)
韩国	1.83(0.27)	2.82(0.75)	1.91(0.27)	2.20(0.50)	3.25(1.07)	2.19(0.46)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2.25(0.45)	2.56(0.71)	1.73(0.22)	2.44(0.71)	3.03(1.16)	1.88(0.39)
ASEAN1	1.81(0.36)	2.72(1.04)	2.08(0.57)	1.89(0.42)	3.02(1.19)	2.22(0.62)
ASEAN2	1.49(0.15)	2.37(0.59)	1.88(0.31)	1.52(0.18)	2.30(0.55)	1.92(0.3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00(0.24)	2.44(0.47)	2.03(0.27)	2.19(0.26)	2.48(0.45)	1.99(0.22)
印度	1.43(0.05)	2.53(0.35)	1.73(0.14)	1.43(0.10)	2.63(0.72)	1.75(0.26)
美国和加拿大	2.18(0.30)	2.38(0.53)	1.76(0.18)	2.16(0.33)	2.37(0.57)	1.76(0.20)
墨西哥	1.68(0.19)	2.26(0.60)	1.54(0.16)	1.76(0.28)	2.25(0.67)	1.53(0.16)

① 柳田健介:「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貿易投資構造」,ポストTPP研究会:「ポストTPP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の経済秩序の新展開」,平成27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16年3月,第73~75页。

② 同上,第74~75页。

表 4 感应度指数(列昂惕夫逆阵行系数之和)

	2000 年			2011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中国大陆	1.69(0.20)	5.01(1.83)	2.81(0.72)	1.92(0.53)	11.65(7.84)	4.92(2.75)
日本	1.25(0.08)	4.94(2.81)	3.98(1.79)	1.22(0.05)	4.39(2.15)	3.46(1.28)
韩国	1.19(0.05)	3.51(1.22)	2.45(0.60)	1.13(0.03)	4.48(1.79)	2.40(0.58)
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1.13(0.01)	2.17(0.56)	2.91(0.47)	1.08(0.01)	2.20(0.48)	2.66(0.36)
ASEAN1	1.36(0.04)	2.16(0.46)	1.88(0.24)	1.36(0.07)	2.36(0.45)	1.99(0.29)
ASEAN2	1.34(0.04)	(2.14)0.30	1.67(0.10)	1.36(0.11)	2.19(0.39)	1.81(0.18)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47(0.06)	1.94(0.30)	2.73(0.30)	1.50(0.08)	1.89(0.33)	3.10(0.35)
印度	1.38(0.05)	2.33(0.27)	1.98(0.22)	1.41(0.11)	2.59(0.83)	2.38(0.71)
美国和加拿大	1.48(0.22)	4.53(2.74)	4.71(2.45)	1.49(0.25)	3.96(2.24)	4.45(2.23)
墨西哥	1.26(0.03)	1.93(0.24)	1.93(0.11)	1.26(0.04)	1.90(0.28)	2.04(0.12)

注: ASEAN1 是指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泰国; ASEAN2 是指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资料来源: 柳田健介:「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貿易投資構造」,ポストTPP 研究会:『ポストTPP におけるアジア太平洋の経済秩序の新展開』,平成 27 年度外務省外交・安全保障調査研究事業、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16 年 3 月,第 75 页,「表 3 レオンチェフ逆行列係数」。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发生同步性增长(参见表 4)。2011 年中国第二产业的感应度指数跃升至 11.65,表明世界所有产业最终需求增加一个单位,引发中国第二产业生产增加 11.65 个单位。其中,国内部分的感应度指数为 3.81,国外部分的感应度指数为 7.84,可见中国经济受国外部分影响的程度已大幅加深,而其背后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经济在迈入 21 世纪之后就逐步扩大全球布局,并进一步深化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度。

实际上,柳田健介的研究成果还表明,与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可见一斑,甚至在很多方面均超出发达经济体。不仅如此,世界经济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反作用力也在不断增强,这实则说明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趋深,中国产业的全球化布局也日趋成熟。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完全在亚太和世界范围内建立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也没有在构建亚太贸易投资新体系的进程中发挥足够的引领力。为此,中国应主动积极地向亚太国家和地区提供贸易投资领域的公共产品。具体而言,即中国可以给予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多的贸易优惠安排和措施;搜集和发布域内贸易投资信息,维护域内贸易流和投资流的正常运转;向域内国家和地区提供主要中间

产品和零部件,提升域内供应链的质量水平;制定贸易标准和服务标准;等等。

与上述内容相类比,中国显然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仅从优惠贸易领域来观察,中国向亚太国家和地区提供的优惠贸易措施极为有限。与此同时,不难发现,尽管中国对非洲大部分国家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优惠措施,但对亚太国家和地区提供的贸易优惠措施却极为有限,仅局限在部分东南亚和大洋洲国家,没有形成辽阔的覆盖网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提供的贸易优惠措施遍布亚非拉三大洲,且几乎完全覆盖整个亚太地区,针对个别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在给予一般贸易优惠的基础上还追加了特别优惠措施。

此外,中国应支持本国企业积极参与亚太供应链的建设和维护,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新建或扩建亚太供应链,同时确保其在整条供应链中的核心和关键地位,带动整条供应链关联企业、部门之间产能合作,形成扩散效应。

总之,中国推动亚太贸易投资规则的构建可谓是正逢其时。中国可以以构建亚太贸易投资新规则为基点,统合国内、国际两大战略,形成内外联动的政策分布,协调国内和海外各产业的有机发展。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之后,中国竭力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力争实现“去杠杆、稳增长、保民生”等宏观经济目标;而在对外经济合作领域方面,中国的切实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多个层面。

第一,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中国积极维护和发展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前行,同时维护WTO的权威性,并有序推动WTO的议题扩容及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有序运行。

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层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相关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关系,扩展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积极参与和引导“中孟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地区性的经济合作项目,有效地辅助“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推进。

第三,在双边经济合作层面,中国积极推进以“产能合作”为重要目标的具体项目的落实和完成,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向周边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优质产能,提升中国与其实际合作的水平和能力。

四、中国引领亚太贸易投资治理机制发展的路径探究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成为亚太乃至全球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强国,同时在亚太域内中国对构建地区性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也是与日俱增。

由此,中国亟须加强对未来亚太贸易投资合理路径的思考和研究,为尽快全面构建和合理完善亚太贸易投资治理规则体系,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的一体化发展,作出积极且必要的努力。为此,中国或许可以从以下各个方面加强工作部署。

第一,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为亚太贸易投资治理的合作梳理正确且长远的价值观取向。同时,以此重要理念为基础,从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逐步构建中国的全方位“引领”优势。

2016年9月于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顺利通过《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G20 Guiding Principles for Global Investment Policymaking)^①和《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 Strategy for Global Trade Growth)^②,标志着中国主导和积极推动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创新取得了新成果,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更迎来新一轮改革新高潮。

表5 《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主要内容

1	政府应避免与跨境投资有关的保护主义
2	投资政策应设置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条件
3	投资政策应为投资者和投资提供有形、无形的法律确定性和强有力的保护
4	投资相关规定的制定应保证透明及所有利益相关方有机会参与,并将其纳入以法律为基础的机制性框架
5	投资及对投资产生影响的政策应在国际、国内层面保持协调
6	政府应有权为合法公共政策目的而管制投资
7	投资促进政策应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具备效用和效率
8	国际社会应继续合作,开展对话,以维护开放、有益的投资政策环境,解决共同面临的贸易政策挑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G20官网公布的《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编辑而成,http://www.g20.org/hywj/dnecwj/201609/t20160914_3459.html。

表6 《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主要内容

1	鼓励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以降低贸易成本
2	加强贸易投资政策的相互协调
3	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4	增强贸易融资
5	制订贸易景气指数
6	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7	关注贸易与发展问题

① 2016年G20峰会筹备委员会《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http://www.g20.org/hywj/dnecwj/201609/t20160914_3459.html。

② 2016年G20峰会筹备委员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http://www.g20.org/hywj/dnecwj/201609/t20160914_3458.html。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G20 官网公布的《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编辑而成, http://www.g20.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14_3459.html。

更为重要的是, 杭州 G20 通过的两个关于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文件均强调了“非约束性原则”, 这不仅充分展现了中国在亚太和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强调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基本合作原则, 同时也为未来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合作创造了弹性的发展空间。

第二, 积极导入和不断创新合作层次和治理规则, 适度加速推进有我参与的贸易投资协定的谈判和落实工作。在未来相关亚太贸易投资协定谈判中, 中国应积极尝试导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 并使其能充分体现在相关的条款和内容之中, 以逐步推动双多边合作内容和合作模式的转型升级。当然, 上述的准入原则和管理模式对相关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求较高, 且容易对部分落后经济体造成经济和战略上的损失, 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应采取“相机抉择”的宗旨, 凭借较为实用的方式和方法推进相关协定的谈判和落实。

需要强调的是, 中国应积极推动 RCEP 和中日韩 FTA 协定的谈判, 并以两者为重要基础, 积极促使 FTAAP 谈判的尽早启动。当前, RCEP 遭遇的主要困难是参与方经济水平及对协定最终文本要求的巨大落差, 导致相关参与方对 RCEP 的最终定位和未来功能发展等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对此, 中国应积极发挥必要的主导力和影响力, 调解和缓和各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分歧, 争取尽早结束 RCEP 的谈判工作。同时, 本着“先有再好”的基本态度, 不断推动 RCEP 实施后的规则完善和协调合作。

就中日韩 FTA 协定而言, 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政治因素的干扰, 而与之相比, 许多技术性的困难或障碍相对较为容易克服。尽管如此, 中日关系、日韩关系出现急速“转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三方在经济领域尤其是贸易投资领域开展相互合作的意愿仍然是明确且积极的。因此,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应积极做好准备, 先解决相关条款的技术性障碍, 同时尝试在合作内容和管理规则上的部分创新, 争取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第三, 中国应努力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导者, 同时更要在亚太域内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挥好“调和剂”、“催化剂”的功能角色。就目前来看,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发展中国家认同渐进、包容和非约束性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而与之相对, 以美国、日本为首的亚太发达国家则强调高水平、高水准且富有强制性的经贸合作协定, 导致亚太域内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亚太经济一体化

的战略议题,形成尖锐对峙。鉴于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亚太国家,中国应主动代表发展中国家在亚太舞台上发声,更应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美、日等亚太域内发达国家协商、博弈,并尽可能达成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性的经验或协议。

另一方面,亚太域内情况复杂,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又参差不齐,因此,很难实现覆盖全部成员、且“一次性达成的”经贸合作协议。有鉴于此,不妨尝试“以大带小”、“从少到多”、“由易入难”的渐进式工作方式,即中国与美、日、韩等亚太域内经济大国先行达成相关经贸合作协议,再逐步推广至整个亚太地区,并最终构建辐射全局的经贸合作体系。当然,在此推进过程中,中国应牢牢掌握好节奏与速度,更要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利益,还要维护好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势。而就合作议题的生成路径而言,可以从“贸易便利化”、“一站式通关”等低门槛切入,再逐步向“零关税”、“原产地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等高层级的经贸合作衍生。

此外,顺应亚太经贸一体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应加速推进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中国应积极落实“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重要理念,推动国内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提升国内产业的研发能力和科技水平,使国内制造类产业逐步攀升至相关产业链的中上游。就生产产品的结构而言,国内企业应以提供全球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中间产品为主线,同时相应生产和出口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总之,中国企业至少应在亚太贸易结构中占据中间产品,尤其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中间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地位,并使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在数量上更要在质量上占据亚太市场的主要份额。不仅如此,中国应积极构建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机制协调、人员往来等在内的“亚太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Asia-Pacific Supply-Chain Partnership, APSCP),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的互联互通,实现无缝、全面连接和融合亚太的远景目标,进而确立中国在亚太乃至全球供应链中的强国地位,以及中国全球制造业强国的明确身份。^①

① 王金强《亚太供应链合作关系的构建与中国的政策选择》,《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1期,第42~43页。

99 An Analysis of the China's FTAAP Strateg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Abstract: With the “Beijing Roadmap” laid out in the Beijing APEC meetings in 2014, the concept of the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FTAAP)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more than 10 years, striding from vision into actual action. The FTAAP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with two considerations for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factors. In view of the status quo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national position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FTAAP will face some obstacles. In the face of the grim situation an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FTAAP strategy, China needs to actively confront and strive against it, including insisting on continuing to build FTAAP to maintain 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further engage with ASEAN to prevent it to 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latform of building the FTAAP;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trategic rol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Keywords: FTAAP strategy; economic cooperation; China's choice

About the Author: Liu Haiq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u Haiquan

117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experienced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with its strong anti-risk capacity and sustained vit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refore the statu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global geo-economic architecture have increased synchronously. This structural upheaval quickly created an important force in transforming the mechanisms of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rigger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atterns and rule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dhering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openness,

tolerance ,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 China establishes an orientation that is correct and of long-term values for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part from that , China participates and leads i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of Asia-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 while it actively exports institutional public goods to the region and strives to promote the new economic orde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wards a more fair , reasonable and perfect direction. In the negotiations on an agreement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 China should actively try to introduce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negative lists” and the principle of “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 by making them fully embodied i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contents , and therefore to gradually promote the content of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orderly expand as well as 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he cooperation model.

Keywords: China , the Asia-Pacific region , economic governance , reform , leadership

About the Author: Chen Youjun i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 Studies ,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en Youjun

136 The Challenges and Impacts on India-US Relations after Trump Came into power

Abstract: India-US relations confronted challenges after Trump took office.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ew trends of Trump’s policy toward India , the new changes in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nd the new adjustments made to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In this regard , India’s domestic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Indian Prime Minister Moody holds high expectations for India-US relations; Indian government officially is more concerned over them; India’s strategic circle is more rational; and the responses of India’s media and the public are more positiv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dia-US relations is influenced by the regional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both countries. Although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ifferent economic interests , Trump’s “America First” policy position constitutes a certain obstacle , and the two sides also have differences in some specific cooperation , the common ground in strategic interests of Indo-Pacific strategies of the two sides , and the need for jointly responding to the rise of China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 diplomatic co-

• 157 •